

韩中乒乓球题材体育电影的民族精神表征差异

— 以《朝韩梦之队 코리아》与《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为中心 —

劉姬香* · 許雁洲**

〈目次〉

- | | |
|-----------------|--------------------|
| I. 绪论 | IV. 文化记忆的影像传达与情感认同 |
| II. 韩中与乒乓球渊源 | V. 结论 |
| III. 韩中民族精神影像叙事 | |

I. 绪论

在当代文化传播格局中，体育不仅是一项竞技活动，更是一种参与国家身份建构、历史记忆塑造与民族精神表征的重要媒介。尤其在韩国与中国语境中，乒乓球作为高度象征性的国民运动，其影像再现往往承载着政治隐喻、历史创伤与民族精神的多重意义。¹⁾作为在东亚地区具有高度象征性的体育项目，乒乓球在韩国与中国的国家叙事中，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文化角色与意识形态意涵。

近年来，韩中两国分别推出以乒乓球运动为题材的主旋律电影——韩国由文盛贤执导的《朝韩梦之队》(2012)，与中国由邓超执导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2023)。前者以1991年朝韩女子联队征战世乒赛的历史事件为蓝

* 高丽大学校 中日语言文学系 博士课程，高丽大学校 第四阶段 BK21 中日教育研究团 参与大学院生：第一作者

** 高丽大学校 中日语言文学系 硕士课程：第二作者

1) 杜文革，〈东亚体育电影中的政治隐喻与身份构建〉，《当代电影》第7期，2021。

本，展现分裂民族间的协作与情感共鸣；后者则聚焦于中国男乒在1990年代低谷期奋力突围的真实过程，重构国家精神与制度信任。这两部影片虽同以乒乓球为叙事载体，但其情节设置、人物塑造、情感基调与精神内核却呈现出显著差异，反映出韩中两国在体育影像中民族精神建构策略与文化心理结构上的深层分野。

在理解体育影像中的“国家寓言”机制方面，文化记忆理论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扬·阿斯曼(Jan Assmann)指出，文化记忆不仅是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更是一种通过媒介持续传承、制度化运作的社会性记忆形式²⁾。其区别于日常交流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强调象征性表达与选择性重建，通过典范事件、纪念场景与文化符号的反复再现，将特定的历史经验上升为“可继承的传统”，从而构建群体的持续性认同。在这一视角下，体育影像不仅叙述历史，更重构历史，使个体经验与国家意志得以在视听文本中象征性结合，转化为具有情感动员力与身份塑造力的“国家想象”。³⁾

目前学界虽已有关于《朝韩梦之队》与《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中民族叙事的个案研究，但系统并置韩中乒乓球影像文本进行比较的研究仍属空白。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政策背景、体育历史或个体影片分析，缺乏从影像叙事结构、性别视角、失败文化与集体伦理等维度展开的理论化讨论。特别是在两国体育文化中“乒乓球”这一高度象征化载体之下，其文化编码、国家情感与身份生产机制的异同，尚未得到系统揭示。

基于此，本文拟以《朝韩梦之队》与《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为核心分析对象，结合叙事分析法与文化记忆理论，从影像文本出发，探讨两国乒乓球题材电影在民族精神表征上的异同。本文将重点回应以下研究问题。韩中是如何通过乒乓球影像叙事建构各自的民族精神谱系的。体育影像是如何介入国家历史记忆与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的。以及，失败意识、性别视角与集

2) 扬·阿斯曼 著，金寿福·黄晓晨 译，《文化记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 王怡，〈从《夺冠》到《中国乒乓》：体育影像与国家精神的重构〉，《现代传播》第3期，2023。

体形象如何在影像中建构出各自的民族性格原型的。通过上述探讨, 本文旨在揭示体育电影作为国家叙事工具的多重功能, 丰富韩中文化比较研究的维度, 并为东亚区域体育影像研究提供具理论深度与文化敏感性的分析框架。

II. 韩中与“乒乓球”文化渊源

乒乓球在东亚体育文化中具有鲜明的政治化特征, 其影视再现往往承载着显著的国家意识形态; 尤其在韩中两国, 乒乓球更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象征意义⁴⁾, 无论是韩国“朝韩联队”的集体记忆, 还是中国“乒乓外交”的历史经验, 都使该运动成为民族身份与集体情感的重要载体。同时, 韩中体育电影在民族精神呈现方式上的差异性, 也为深入探讨文化叙事的国家逻辑与心理结构提供了理想的比较样本。

在韩国, 1973年南斯拉夫萨拉热窝举行的第3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成为韩国女子乒乓球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以郑贤淑、金顺玉为代表的韩国女队, 凭借卓越的团队协作与超越性的比赛状态, 成功闯入女子团体决赛, 最终斩获银牌。这是韩国女乒在世乒赛上的首次奖牌, 不仅标志着韩国乒乓球竞技水平跻身世界前列, 也象征着女性体育力量在国家体育话语中的初步确立。从性别角度来看, 这一胜利对打破当时社会对“女性适合温顺运动”的刻板认知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后来女性参与竞技体育打开了空间。与此同时, 1973年的成就也促使韩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对乒乓球项目, 特别是女子项目的政策支持, 成为体育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4) “地缘政治象征意义”是一个结合了地缘政治(geopolitics)和象征意义(symbolic meaning)的复合概念, 常用于分析国家、地区、领土或某些事件在国际关系中所承载的超越实际功能的政治象征性内涵。具体来说, 它指的是: 某一地区、地点、建筑、人物或事件在地缘政治结构中所代表的象征性地位、政治意义或文化价值, 而这种意义通常超越其实际地理或战略功能, 在国际、国家或地区层面上具有特殊的政治话语作用和意识形态功能。周尚意 著, 《空间政治: 地缘政治批判的理论与实践》(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 78-82页。

1991年，在日本千叶举行的第41届世乒赛中，朝鲜与韩国联合组建女子代表队参赛并最终夺得金牌，这一“统一队”事件被视为南北对立历史中最具象征性的体育时刻之一。⁵⁾时任联合队教练安宰亨回忆道：“两边选手第一次一起训练时，不敢说话，但一旦站到球桌两侧，节奏就一致了。”⁶⁾有媒体称之为“静默中的共鸣”，这种“从身体协同到民族认同”的体育经验，为后来的《朝韩梦之队》电影提供了真实而动人的叙事原型。

与之相对，在中国，乒乓球自1950年代被列为“重点项目”以来，逐步成为国家荣誉的象征性载体。1959年，容国团在多特蒙德夺得中国体育史上首个世界冠军，被视为新中国“体育崛起”的象征。⁷⁾其后，中国乒乓球队在国际赛场屡获佳绩，为国家构建起“技术自信”与“文化尊严”的双重认同结构。尤其在1971年“乒乓外交”事件中，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以“以球会友”的方式打破冷战僵局，此举被视为体育介入国际关系的典型案例。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称之为“打破中美外交沉默的转折点”⁸⁾。《人民日报》随后发表评论指出：“小球转动大球，是人民体育为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⁹⁾

这一国家象征传统在新时代运动员身上亦得到延续与重塑。2023年德班世乒赛后，中国新生代运动员孙颖莎因其出色表现与青春形象迅速在国内外引发“孙颖莎现象”，成为中国媒体集体塑造的“新国球代言人”。¹⁰⁾该现象不仅体现了体育明星的偶像化与文化传播功能，更反映出乒乓球作为国家文化象征在新时代的转译机制。2024年巴黎奥运会闭幕式上，孙颖莎作为亚洲代表参与圣火熄灭仪式，标志着她个人形象在全球体育语境中完成了从运动员到

5) <1991년, 치바의 기적>, 《조선일보》, 2012년 5월 2일자.

6) 安宰亨接受《韩联社》专访，见<치바의 기억, 다시 남과 북이 함께 설 수 있을까>, 《연합뉴스》, 2018년 4월 4일자.

7) 陈晖, <国球的诞生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从容国团看中国乒乓球早期史>, 《体育文化导刊》第3期, 2017年, 65-70页.

8) Nicholas Griffin, Ping-Pong Diplomacy: The Secret History Behind the Gam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Scribner, 2014.

9) 《人民日报》社论：“小球转动大球”，1972年4月11日，第1版。

10) 参见《人民网》，《孙颖莎德班夺冠，中国女乒包揽五金》，2023年5月29日。

文化代言者的象征跃迁。这一仪式性事件不仅是对她个人成就的肯定，也彰显了中国“国球精神”在国际场域中的可见性、传递力与象征性价值。同时，孙颖莎的国民性影响力更是反映了乒乓球超越体育本身的民族精神象征意义。

如果说“朝韩联合队”体现的是冷战格局下对“统一理想”的民族疗愈叙事，那么“孙颖莎现象”则揭示出在国家强势文化传播体系中，个体体育英雄如何承担起国家形象再生产与民族精神符号化的功能。两者虽所处时代不同、象征结构各异，但同样通过乒乓球将体育转化为国家意志、文化身份与情感认同的投射媒介。

另外，安宰亨与焦志敏的跨国婚姻，不仅是体育史中的私人事件，更是一则典型的“冷战后东亚跨国文化交往”个案。在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前夕，两位身处对立制度阵营的乒乓球国手，因国际赛事相识，并最终绕道美国成婚。这段“第三国恋爱的跨国婚姻”故事，不仅体现出体育作为跨文化交流媒介的独特力量，也揭示了个体情感如何在政治体制尚未接轨的状态下率先突围。安焦之恋所承载的，不仅是个人的选择与坚持，更是中韩两国民间互信萌芽的具象化体现。婚后焦志敏定居韩国，从“国家代表”转变为“文化桥梁”，参与青少年乒乓球推广与公共活动，其个人身份的变迁亦映照出女性运动员在跨国迁移与文化适应中的多重角色。通过这一案例可见，体育婚恋在东亚冷战后语境中，既是一种情感形式，也是一种软性的文化外交实践，其叙事结构往往兼具国家想象、制度转型与个体自我认同的多重维度。

在竞技格局上，韩中两国长期构成世界乒坛的“核心对抗轴”。中国乒乓球始终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而韩国选手则常以“挑战者”身份打破垄断格局，形成带有文化隐喻的“强者稳定到破局者突袭”模式。例如柳承敏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击败王皓为韩国夺得男单金牌，被韩媒称为“民族自信复苏的一刻”¹¹⁾。这种长期竞技张力构成了韩中乒乓文化间既对抗又互认的关系，也深刻影响了各自体育影像中的民族精神建构方式。在影视表达中，《朝韩梦之

11) <류승민, 황홀했던 탁구 금메달>, 《중앙일보》, 2004년 8월 24일자.

队》通过重现1991年联合队击败中国队的历史片段，实现了民族情感的叙事凝聚；而《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则围绕男乒低谷期的历史真实展开，将个体奋斗上升为制度修复与精神重塑的国家隐喻。两片虽描绘不同的事件与胜负走向，但其核心逻辑均以“乒乓球作为民族精神象征”而建构起高度的文化与心理动员机制。

综上所述，乒乓球不仅是韩中两国长期竞技联系的纽带，更是一种文化交往、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复合性媒介。正是这种深层互动的历史土壤，为乒乓题材影像文本提供了丰沛的叙事资源，使其得以在影像中承载国家意识、民族理想与人文共感的多重意义。

III. 中韩民族精神影像叙事

本文所选取的《朝韩梦之队》(2012)与《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2023)分别代表了韩中两种民族精神影像叙事路径。通过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视角可见，这两部作品在重构历史事件、形塑共同体意识与呈现失败经验等方面，体现出文化记忆“选择性、象征性与仪式性”的核心机制。¹²⁾阿斯曼所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强调群体并非被动保存过去，而是通过“选择性”(selectivity)主动构建记忆内容，即在庞杂的历史经验中择取某些事件作为记忆焦点，并将其象征化、仪式化，从而内化为集体身份的一部分。其中，“选择性”指的是记忆内容的社会筛选过程；“象征性”则意味着这些内容常通过具体符号、人物与叙事模式象征特定价值；而“仪式性”强调记忆的重复性与再现性，如影视再现、国家纪念等方式，不断在社会生活中唤起认同与情感。

此外，阿斯曼亦指出文化记忆的传递依赖于“情境化的社会记忆承载者”(situational social carriers)，包括在特定场域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体、机

12) 扬·阿斯曼 著，金寿福·黄晓晨 译，同上书，6-8页。

构与媒介，例如影片中的代表性运动员形象、记者叙述视角或国家队教练等，均可视为记忆的传递者与情绪的唤起者。

首先，在进入影像文本分析之前，首先需说明《朝韩梦之队》的电影创作动因与拍摄背景。该片拍摄的初衷是为了纪念1991年朝韩女子联合乒乓球队共同参赛并夺得世乒赛女团金牌这一“统一事件”二十周年。2010年前后，朝韩关系持续恶化，2000年“阳光政策”以来的和平对话氛围逐渐冷却，尤其是在2010年“天安舰事件¹³⁾”发生后，南北政治对立达到冷战后少有的冰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创团队希望通过回溯这一真实发生的短暂南北合作经验，唤起当代观众对民族情感整合与“统一想象”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共鸣。

影片自2011年筹拍，2012年正式上映，正值李明博总统执政末期(2008~2013)¹⁴⁾，该时期的韩国政府对朝政策趋于强硬，强调国家安全与主权防卫。然而，在文化政策层面，政府支持韩流与文化软实力的国际输出，间接促成了该片的拍摄环境。¹⁵⁾虽然《朝韩梦之队》并非官方主导的国家项目，但得到了文化领域的政策支持，其诞生体现了民间电影产业对历史议题的主动挖掘与再创造。

具体到文本层面，《朝韩梦之队》以1991年朝韩女子联合乒乓球队夺得

13) “天安舰事件”是指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的“天安”号护卫舰在黄海白翎岛附近沉没，造成46名韩国海军士兵死亡。韩国政府经联合调查后宣布此事件为朝鲜潜艇鱼雷攻击所致，朝鲜方面则坚决否认，引发韩朝关系严重恶化。参见：South Korean Joint Civilian-Military Investigation Group, Investigation Result on the Sinking of ROKS Cheonan,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epublic of Korea, 2010.

14) 李明博政府(2008~2013)对朝政策相较卢武铉与金大中时期的“阳光政策”更为强硬，强调对北制裁、军事防卫与国家安全。与此同时，该政府亦推动“文化强国战略”，扩大韩国文化产业对外影响，间接促成一系列文化作品的产业化生产。参见：김상태, <이명박 정부의 대북정책과 그 평가>, 《국가전략》 제17권 제2호, 세종연구소, 2011.

15) 影片主创团队曾在采访中表示，拍摄本片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纪念历史事件，更希望“在现实政治无法对话的当下，通过电影让南北韩再次在情感层面接近”。参见：정윤철 감독 인터뷰, <코리아, 눈물과 웃음으로 전하는 진심>, 《씨네21》, 제849호, 2012년 4월.

世乒赛冠军为素材，通过女性视角重构了冷战秩序下南北韩朝在体育场域实现短暂合作的历史经验。影片开篇以真实人物玄静和接受采访时的落泪镜头导入历史回忆，建立“当下与过去”之间的情感通道，并提示观众进入一个以记忆情绪为核心的叙事结构。这种“回溯式”开场形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记忆的仪式化装置，即通过“见证性个体”的话语框架，引导观众将接下来的故事视为可传承的集体经验。

影片在重构“千叶事件”的过程中，并未突出政治口号或国家意识形态，而是选择性地聚焦于训练摩擦、生活细节与身体距离等情境化经验。训练馆中彼此“不给球”的冷漠、食堂中因泡菜味道而引发的争执、朝鲜选手拒绝韩国队员递水的尴尬，都被细腻呈现出来¹⁶⁾，这些都构成了关系建构的过程性节点。这种“生活化记忆”对应阿斯曼所谓“情境记忆的社会载体”(Sozialträger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强调集体认同在重复的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¹⁷⁾影片亦特别强调失败的“情感功能”。在一次训练失败后，主将玄静和与李粉姬因心理挫折发生争执，随后在洗衣间的冲突被长镜头静静凝视。这一细节展现出失败不仅作为竞技失误存在，更作为信任瓦解与重建的情感转折。影片未将失败处理为过渡性障碍，而是作为“共同体情绪张力的真实阶段”，以“情感波动到危机再到修复”为轨迹构建集体经验。¹⁸⁾电影试图将“大政治”转化为“小关系”，强调即使制度不同、立场对立，但作为普通人，她们可以相互理解、支持与包容。这种细节描写凸显出一种以人性为基础的民族精神：不是基于体制或意识形态统一的强制性民族主义，而是基于人际信赖与感情建立的“共情型”民族认同。

更具文化记忆意义的是影片中女性身体的“照护劳动”所发挥的象征功能。如玄静和在队员晕倒后帮其按摩、按压太阳穴，构建出一种身体亲密性

16) 《朝韩梦之队》电影片段，约01:12:00~01:14:00，具体是在朝韩联队准备迎战1991年日本千叶世乒赛决赛前夕的关键场景中。

17) 扬·阿斯曼 著，金寿福·黄晓晨 译，同上书，59-66页。

18) 朴恩静，〈女性视角下的朝韩体育影像叙事研究〉，《韩国影像文化研究》第18卷，2021。

与情绪稳定机制。这种以“亲密劳动”为媒介的民族想象，体现出文化记忆在性别结构中的“柔性维持机制”¹⁹⁾。如亚莉·霍奇查尔德所言，情感劳动在集体场域中承担着调节与维系功能²⁰⁾，而《朝韩梦之队》正是以此形式塑造“民族精神”。影片结尾亦采取极具“文化仪式性”的克制策略。胜利后，两位主角未高喊口号，也无激烈庆祝，而是缓慢对视、落泪。这种“非语言记忆”的视觉处理，强化了记忆的情绪感染机制，使观众通过此建立起与集体经验的认同关系。²¹⁾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改编自2000年代初中国男乒陷入低谷、后在教练蔡振华带领下实现“绝地反击”的真实历史。影片自筹备之初便明确定位于“主旋律与体育叙事”的融合范式，意在通过重塑国家队在国际赛场中由衰至盛的历程，突出中国体育精神中“不服输、敢于挑战”的核心特质。该片于2020年立项，正式拍摄时间则处于2021年疫情之后的特殊社会节点。当时中国社会正经历新冠疫情带来的深远影响，伴随着国际关系紧张与经济结构调整，国内文化政策亦明显倾向于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这一背景下，影片天然承担起“提振民族信心、重建精神共识”的文化使命，其影像构建不仅服务于记忆再现，更深层次地参与了国家精神合法性的影像再生产。

与《朝韩梦之队》所展现的情感协商型民族精神不同，《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则以国家制度逻辑为核心，通过“从失败到改革，最终获得胜利”的

19) 影片《朝韩梦之队》中，在训练场上，一名队员因体力不支晕倒，玄静和第一时间上前进行身体照护，包括搀扶、按摩与按压太阳穴等动作(约第1小时03分处)。该场景通过细腻的身体接触表达出集体内部的“非暴力性认同生成”，可视为文化记忆在性别维度中的“情感调节机制”。参见：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Aleida Assmann, *Forms of Memory*, in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ed. by Astrid Erll and Ansgar Nünning, De Gruyter, 2008, pp.25-37.

20) 阿莉·拉塞尔·霍奇查尔德 著，周晓虹等 译，《被管理的心：情感的商品化》(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20页。

21) 影片结尾处，两位主角在胜利后彼此凝视而泣，背景人物与声音逐渐模糊淡出，未设置高亢音乐或国家口号(《朝韩梦之队》，片段时间约第112分钟)。这一设计通过静默凝视与慢镜头构图，构建出文化记忆的“非语言情绪场”，使观众通过情绪共鸣而非语言接受，实现与民族经验的深层联结。

主旋律叙事结构，重建国家精神的合法性与记忆工程。影片开篇通过字幕引入“男乒陷入最低谷”，并迅速切入央视新闻报道镜头，观众表情特写与紧张配乐共同构成“国家危机通过媒体放大，以此动员情绪”的记忆激活模式。该片中的集体记忆由制度话语主导，如总局会议上的“我们不能让世界不再敬畏我们²²⁾”的台词，明确将体育失败与国家形象直接绑定。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在国家层面往往依靠“组织性媒体与制度性话语”对经验进行编码²³⁾，由此可见，该片是将失败转化为国家信仰重建的起点。

而在个体经验的呈现上，影片则将其完全纳入国家逻辑。如老将陈文落选国家队，仅说“我支持国家决定²⁴⁾”后便淡出情节，未展现其内在挣扎与情绪转化。正如詹明信在论国家寓言时所述，国家叙事中的“个体实践往往被转化为国家工程的象征性代偿²⁵⁾”。陈文的沉默退出体现的正是文化记忆中的“功能性选择”：情绪、挣扎、矛盾等非制度性因素被清除，以确保叙事的一致性与动员力。

影片对“共同体”建构亦高度依赖制度组织：动员大会、训练方案、改革阶段性推进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秩序。与《朝韩梦之队》通过身体接触与关系生成建构共同体不同，《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以“计划与执行”重建民族精神，其集体认同不是自然发生的社会性过程，而是由上而下的国家安排与技术重组。在情绪结构上，该片采用典型“高潮式仪式叙事”：决赛场景

22) 《朝韩梦之队》，00:29:50.

23) 扬·阿斯曼 著，金寿福·黄晓晨 译，同上书，30-33页。

24) 《中国乒乓球之绝地反击》，01:50:22.

25) “国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是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提出的重要文学批评概念，首次系统提出于他1986年发表的论文《第三世界文学中的国家寓言》(“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中。詹明信提出：“所有第三世界文学，即使是个人主义的私小说，也总是以某种方式是一种关于集体和国家情境的寓言。”这意味着，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文学中，即使“表面上是关于个体命运、日常生活或心理挣扎的叙述，其背后往往都承载着关于国家历史、民族命运和社会结构变迁的隐喻或寓言结构。”詹明信 著，《政治无意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9页。

中,关键一球反复慢放、观众流泪、升旗、配乐高昂以及解说词:“他们用信念让中国重回世界之巅²⁶⁾”作为精神定点将观众情绪推至顶峰。这一“胜利的可视化仪式”凸显文化记忆的“象征再现功能”,将历史危机转化为国家精神复归的视听象征。它不仅呼应了现实社会在新冠疫情冲击后的恢复进程,也体现出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百折不挠”的心理韧性 with 集体意志。更重要的是,影片通过团队协作与制度调动的描写,传达出一种制度性信念:只要有坚定的组织力与精神信仰,任何困难都可以被克服,胜利终将到来。这种精神体现出新时代中国所强调的民族信心与奋斗精神,表现出“顽强拼搏、不畏失败、自我超越”的核心民族精神特质。

总而言之,《朝韩梦之队》与《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这两部乒乓球题材体育电影,分别呈现了韩国与中国在文化记忆框架中对民族精神的不同影像叙事策略。在韩国语境中,文化记忆更强调“生活化”“情感性”与“协商性”,即通过对个体记忆、女性身体与失败经验的情境性重现,书写分裂民族在非政治语境下的情感连结。这种柔性结构契合了冷战后韩国民族想象中“非意识形态化”与“人本主义”倾向的文化特征。反观中国语境,则更强调“制度化”“象征性”与“功能性”,通过国家工程逻辑整合个体实践,将失败转化为历史必然的过渡阶段,从而完成国家精神的视觉仪式化与合法性重建。

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角度来看,韩国的影像记忆策略倾向于“底层发生”与“记忆碎片的情感缝合”,表现为对微观生活与身体感知的细腻描写;而中国的记忆工程则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制度统摄与“胜利再现”的象征秩序。两国在民族精神的建构中分别选择了“情感修复”与“信仰重建”这两种不同路径,前者通过“失败的伦理意义”实现民族认同的更新,后者则通过“危机的制度整合”实现国家意志的再生产。这一差异不仅源于影像叙事美学上的偏向,更根植于两国历史文化结构的深层心理逻辑。韩国在面对历史创伤与民族分裂时,更倾向于通过个体情感经验的修补,建构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温和共同体”;而中国则在面对制度危机与国际压力时,持续动员体育与影像作为“国

26) 《中国乒乓球之绝地反击》, 02:05:00.

家寓言”的重要载体，强化民众对国家叙事与历史正当性的认同。正因如此，这两部影片所承载的文化记忆，既是对历史事件的再现，也是各自国家如何定义“民族精神”与“历史合法性”的集体心理投射。

IV. 文化记忆的影像传达与情感认同

在当代国家文化传播与社会情绪治理体系中，体育电影不仅承载着叙述历史、赞颂成就的纪实功能，更在隐性层面承担着重构集体记忆、激活情感共鸣与建构认同机制的重要角色。尤其在中韩国家语境中，乒乓球题材电影作为国家记忆工程与社会情绪管理的双重媒介，其影像化表达蕴含着复杂的文化政治意义。通过对乒乓球题材体育电影的文化记忆建构方式进行深入比较，可以揭示出韩中在国家叙事结构、集体情感处理与观众认同组织方面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并非局限于个别文本层面，而是反映出两国文化制度、社会结构与情绪政治(emotion politics)之间的深层分野。

阿斯曼所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基本框架。文化记忆不仅是历史内容的储存系统，更是一种对经验的组织方式，其关键不在于“过去发生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共同记得”与“我们借此确认我们是谁”。²⁷⁾体育影像正是这种“共同记忆”建构最有效的媒介，它通过可视化结构与情绪机制，使观众在集体感受中完成对国家或民族的自我归属。

韩国影片《朝韩梦之队》展现出一种去政治化、去组织化、去动员化的情感建构路径。影片避开了将南北朝韩联合参赛上升为政治议题的可能，而是通过个体互动、微观情感与日常冲突构建了一种关系性、协商性与经验性为核心的记忆框架。在一场午休片段中，两名朝鲜与韩国选手因房间温度问题产生矛盾，朝鲜选手悄悄关窗后，韩国选手拉开窗帘并小声抱怨，两人相

27) Jan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36-41.

视后陷入沉默。镜头未推进冲突,而是选择中景静止构图,以沉默的气氛与眼神的交汇传递出“情绪被感知”的关系生成机制。这种“非爆发型”情绪镜头不仅塑造了柔性情感节奏,也构成了文化记忆中“情绪缝合”的象征结构。²⁸⁾

此外,影片中,一次朝韩联合训练中,一位朝鲜选手因动作不标准被韩方教练批评,镜头没有转向惩罚性动作,而是聚焦其手部动作、眼神回避与内心不安。²⁹⁾这种细节化的处理方式使得观众关注“被批评的人是否伤心”而非“集体是否进步”,即将情绪的中心从国家意志转向个体感知。这种基于微观经验的文化记忆逻辑,不是通过胜负建构国家,而是通过共情实践建构关系共同体。这显示出韩国文化更倾向于在去制度化与情感协商中处理创伤记忆与分裂历史,它体现的是社会心理系统中的内聚需求,而非国家体制中的动员逻辑。

相对而言,在中国的体育影像系统中,《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代表了一种以国家制度为主导、以情绪动员为目标的文化记忆建构机制。在片中前半段的“封闭集训”情节中,主教练蔡振华要求运动员每天凌晨五点起床跑圈,镜头特写球员脸上的汗水、脚步声与喘息声,通过近距离拍摄与低角度构图,制造出一种“集体受难”的身体记忆感。³⁰⁾这种身体的极限体验成为国家危机背景下的象征性苦难叙事,与文化记忆中的“创伤与超越”逻辑密切对应。

另一个场景出现在教练组讨论战术改革策略时,蔡振华面对训练失败,重提“狼性精神”,并要求制定一套专门应对欧洲球员的左手打法。在此段落中,影片多次使用会议室俯拍镜头与剪影式构图,使观众感受到制度正在从上而下施压,形成一种无形的意识形态“重构力”。这类技术性讨论被叙事转化为民族“策略转型”,以系统话语替代个体情绪,实现文化记忆的理性化编码,即通过“组织性应对”来消解失败的情绪性后果,完成情感重建的制度化路径。这种文化记忆的建构机制强调的是组织性、一致性与象征性效率,体

28) 《朝韩梦之队》, 00:47:00. 房间温度争执场景。

29) 《朝韩梦之队》, 00:58:00. 教练批评后训练段落。

30) 《中国乒乓球之绝地反击》, 00:18:00. 清晨训练场景。

现出中国影像对“情绪国家化”的高度整合能力。更关键的是，影片所构建的视觉节奏、情绪推进与价值确认，最终在决赛场景中实现高潮化呈现。尽管影片未完全回避人物个体性，但其叙事动能几乎全部指向国家整体的信仰修复。这种“情绪的国家化处理”使得记忆被转化为可视的、组织性的“精神仪式”，观众在感动中实现身份认同，在视听高潮中完成国家归属。

在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框架下，《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对历史的再现并非出于单纯的纪实目的，而是通过对特定历史节点与叙事元素的“选择性记忆”，服务于当下国家叙事与精神重建的文化目标。影片有意淡化当年中国男乒所处低谷的复杂历史语境，转而突出其“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主旋律进程，将体育领域的转折性事件有机纳入国家精神史的宏大叙述之中。这种记忆重构策略，不仅将个人奋斗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象征性体现，也使体育成就成为“民族信仰”的可视化载体，从而实现对集体记忆的统一编码与情感共鸣的有效动员。在这一过程中，影片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主要集中于顽强拼搏、不畏失败、自我超越等核心价值上，进一步彰显了在危机语境中国家对精神共识的组织能力与文化生产的引导力量。

两种影像传达策略的差异，也体现出对观众“情感认同”机制的不同期待。《朝韩梦之队》通过构建具有矛盾、挣扎与修复过程的角色，促使观众在“反复冲突到共同训练，再到失败承受，最后互相依靠”的关系发展中逐步构建情感认同。这种认同不是被动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结果，而是在共情、理解、共振等心理历程中自发生成的“底层共鸣”³¹⁾。而《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中的认同机制，则建立在“目标一致与信仰统一，再到制度贯彻”的线性逻辑上，观众被引导将情绪投注于国家团队的胜败结果，并最终在胜利时刻实现“集体情绪”的高潮共鸣³²⁾。这种“预设性认同”依赖于影片设定的国家危机与救赎结构，而非个体体验与感知的自由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像情感结构的背后实则体现出不同的文化政治逻

31)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18-35.

32) 钟鸣, 〈影像中的情绪建构与民族认同〉, 《现代传播》第3期, 2019。

辑。《朝韩梦之队》所表达的记忆结构，体现了韩国在后冷战语境中对“去意识形态化民族想象”的探索，即通过对历史创伤的情感再现，以柔性修复分裂经验、避免僵化国家话语的再次复归。而《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则体现出中国国家影像机制中“功能性记忆”对观众情绪的组织，即在社会危机、民族焦虑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影像重构统一的历史叙述逻辑，并将其内化为主流信仰的一部分。这种“情绪政治”的影像体现，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仪式表演，也是对观众情绪管理与认同建构的文化调控。

总结而言，体育电影作为文化记忆的情绪媒介，其“影像传达与情感认同”的机制体现出国家心理结构的深层差异。《朝韩梦之队》强调“在情境中缝合记忆”，通过生活细节与情绪张力唤起对统一愿景的柔性想象；在现实中南北对立加剧的时刻回望1991年的“统一时刻”，本身就是一种情感性记忆的政治实践。通过温情化的日常重现，电影向观众传递一种民族精神愿景：即使现实难以和解，但曾经的“团结”是可以铭记、怀念，乃至以此为基础想象未来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则强调“在制度中重构信仰”，通过宏大叙事与视觉动员完成国家精神的象征性再生产。影片诞生于中国深受新冠疫情冲击、社会情绪低迷的时期，其影像风格与叙事逻辑本身就承载着提振士气、重塑国家信心的时代任务。这种“制度信仰”叙事模式，不仅服务于对集体意志的重申，也在动员观众情感认同的过程中强化了国家与个体命运的绑定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体育影像作为情绪治理与文化记忆双重机制的载体，正成为国家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高度敏感的映射系统。特别是乒乓球题材的体育电影，在承载地缘政治经验与民族情感历史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入东亚现代国家“情绪政治”“影像制度”与“记忆美学”异质结构的有效入口。将此类影片置于文化记忆理论的比较视野之中，既有助于揭示影像如何转化历史经验、重构共同体想象，也为理解国家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影像话语形塑社会情感与文化认同，提供了关键性的研究路径。

V. 结论

本文以《朝韩梦之队》(2012)与《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2023)两部乒乓球题材体育电影为核心文本,结合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詹明信的“国家寓言”范式以及情绪政治等理论视角,深入探讨了韩中两国在体育影像叙事中所呈现出的民族精神建构机制与文化记忆表达方式的差异。研究发现,两部影片虽皆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均以体育竞技作为情感激发与集体记忆的载体,但其在叙事结构、情绪组织与认同模式上的差异,实则揭示出韩中国家文化结构与社会心理机制的深层分野。

在《朝韩梦之队》中,文化记忆以个体经验为入口,以女性身体为媒介,构建出一种“柔性协商型”的民族想象。影片强调生活细节中的情绪摩擦与修复,呈现出一种去意识形态化、强调关系性与共情的情感共同体结构。这种记忆机制体现出韩国社会对“非国家化”历史表达的高度敏感,亦回应了其在冷战后历史认同体系重构中的现实需求。在此过程中,文化记忆不仅是一种再现手段,更成为连接分裂历史与未来统一想象的象征通道。

相较之下,《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则通过制度话语主导的主旋律叙事,构建出一种“功能性国家精神”的再生产模式。影片将个体经验纳入国家逻辑,并通过媒体、会议、制度改革与竞技胜利连续串联,完成了对国家信仰体系的视觉化编码。在这一影像机制中,文化记忆不再是开放性的历史诠释空间,而是服务于国家叙述稳定性的政治工具。体育胜败的舞台被赋予国家形象的象征功能,从而在视觉仪式中实现对观众的情绪动员与政治认同重塑。

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韩中两国体育电影所体现的记忆路径分别指向“自下而上的情感缝合”与“自上而下的制度统摄”。前者通过失败经验的伦理意义,实现社会创伤的温和修补;后者则通过危机整合与胜利转化,推动国家精神的合法性重建。这一差异不仅反映出两国在历史表达与国家形象建构上的路径选择,更提示我们在研究当代体育影像时,需超越事件本身,深入探

讨影像所参与的“国家情绪生产机制”与“文化政治治理结构”。

综上所述, 体育电影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其背后的记忆叙事与情感组织机制, 深刻揭示了国家如何在视觉场域中建构集体认同与历史正当性。韩中乒乓球题材电影的比较研究, 不仅丰富了东亚影像文化的跨国理解路径, 也为我们理解“国家、历史、情感”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有力的分析范式。

然而, 这一研究仍存在可进一步拓展之处。未来的研究可考虑纳入观众接受维度, 对不同年龄层、社会背景的观众如何解读、共鸣; 亦可将目光扩展至韩中日以外其他东亚国家, 比较其体育影像中民族精神与文化记忆的共性与差异, 进一步深化东亚文化中的“视觉国家主义”问题。同时, 女性身体、边缘群体与新媒体平台在影像记忆生产中的能动性, 也值得进一步关注与分析。

在影像与国家关系不断重塑的今天, 体育电影不仅记录历史, 更创造历史。它在观众的情绪震荡与身份认同中, 构成了国家想象的动态回路。因此, 对其进行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的系统分析, 不仅是对一类电影类型的文本研究, 更是对当代社会精神结构与国家文化机制的深入观察。

< 参考文献 >

- 文盛贤执导电影, 《朝韩梦之队》(2012)
- 邓超执导电影, 《中国乒乓球之绝地反击》(2023)
- 임지현 저, 《기억 전쟁》, 서울: 인문과학사, 2008.
- 김미경, 〈기호학적 방법을 통한 영화 《코리아》에 내재된 스포츠 이데올로기 분석〉, 《한국여성체육학회지》 제27권 제2호, 2013.
- 김용은, 〈스포츠 영화 《코리아》의 재현된 이미지 연구〉, 《한국스포츠사회학회지》 제26집, 2013.

- 한승현, 〈분단과 스포츠의 문화정치: 영화 《코리아》의 민족담론 분석〉, 《영상문화》 제24호, 2013.
- 박윤정, 〈영화 《코리아》에 내재된 남·북 단일팀의 의미와 이데올로기〉, 《체육연구》 제9집, 2013.
- 전우성, 〈영화 《코리아》에 내재된 스포츠 이데올로기 분석〉, 신라대학교 교육대학원석사학위논문, 2013.
- 阿莉·拉塞尔·霍奇查尔德 著, 周晓虹等 译, 《被管理的心: 情感的商品化》, 北京: 三联书店, 2017.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吴叡人 译,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2.
- 杜文革, 〈东亚体育电影中的政治隐喻与身份构建〉, 《当代电影》 第7期, 2021.
- 梁文道, 〈从“乒乓外交”到“联队精神”: 东亚体育政治的文化转型〉, 《国际观察》 第3期, 2015,
- 刘悦笛, 〈体育、媒体与国家认同——论“孙颖莎现象”的文化意涵〉, 《体育与社会科学》 第4期, 2023.
- 朴恩静, 〈女性视角下的朝韩体育影像叙事研究〉, 《韩国影像文化研究》 第18卷, 2021.
- 王怡, 〈从《夺冠》到《中国乒乓》: 体育影像与国家精神的重构〉, 《现代传播》 第3期, 2023.
- 扬·阿斯曼 著, 金寿福·黄晓晨 译, 《文化记忆》,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张婷, 〈体育电影的叙事惯性与意识形态功能探析〉, 《电影艺术》 第9期, 2020.
- 郑雪来, 〈类型电影研究的路径与转向〉, 《现代传播》 第10期, 2018.
- 周尚意 著, 《空间政治: 地缘政治批判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钟鸣, 〈影像中的情绪建构与民族认同〉, 《现代传播》 第3期, 2019.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 Assmann, Jan,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Jan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 Writing, Remembrance,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Sebastian Veg, “The Rise of ‘Red Memory’ in China: Cultural Heritage, Class and Politics,” *China Perspectives*, 2019.
- 〈1991년, 치바의 기적〉, 《조선일보》, 2012년 5월 2일자.
- 〈치바의 기억, 다시 남과 북이 함께 설 수 있을까〉, 《연합뉴스》, 2018년 4월 4일자.
- 〈류승민, 황홀했던 탁구 금메달〉, 《중앙일보》, 2004년 8월 24일자.
- 《人民日报》社论: “小球转动大球”, 1972年4月11日.
- 《人民网》, <孙颖莎德班夺冠, 中国女乒包揽五金>, 2023年5月29日.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spirit representation between two East Asian sports films: *As One* (2012, South Korea) and *Ping-Pong: The Triumph* (2023, China). Drawing on Jan Assmann’s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and Fredric Jameson’s concept of national allegory, the study explores how table tennis—a sport highly symbolic in both countries—functions as a medium for shap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memory. *As One* constructs a “soft, empathetic nationalism” through intimate portrayals of female athletes, emo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everyday interactions, emphasizing depoliticized, relational, and

negotiated memory. In contrast, *Ping-Pong: The Triumph* employs a “failure-reform-victory” narrative underpinned by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and visual rituals, reinforcing national faith and state legitimacy. The two films represent divergent cultural memory strategies: bottom-up emotional repair in the South Korean context, and top-down institutional consolid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se differences reflect broader national psychologies—South Korea’s post-Cold War healing of historical division versus China’s post-crisis reinforcement of national narratives. By comparing the narrative and affective mechanisms in both films, the study reveals how sports cinema operates as a vehicle for emotional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memory in East Asia, contributing to the discourse on visual nationalism and sports culture.

Key Words : 体育电影(sports film), 民族精神(national spirit), 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 情绪政治(motional politics), 乒乓球(table tennis), 国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